

扶贫项目参与、后续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管理层持股与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李泽建, 韩佳宏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昆明 650093)

摘要:基于后扶贫时代的发展现状,选取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探究扶贫项目参与和后续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扶贫项目参与、后续扶贫计划对企业绩效呈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可为吸引企业加入后扶贫建设,从而实现扶贫企业和脱贫人口联动互赢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后扶贫时代;扶贫项目参与;后续扶贫计划;管理层持股比例;内部控制;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2)01-0014-08

为解决中国部分区域贫困现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自 2013 年起,全国实行精准扶贫战略,通过产业发展脱贫、易地搬迁脱贫、转移就业脱贫、生态保护扶贫及教育扶贫等扶贫举措确保实现扶贫到村到户。截至 2019 年,中国贫困人口已累计减少约 9 109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2% 以下,扶贫工作的实施取得阶段性胜利。2021 年中国已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阶段目标已从全面脱贫过渡到解决脱贫不稳问题,为此继续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是当下势在必行的环节。在社会、人口、经济、环境、资源上相互协调,建立长期有效的扶贫机制,提高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性^[1]。相较于单一精准扶贫“谁贫困就扶持谁”的“即时性”,后扶贫时代背景下的精准扶贫是预防返贫和新发生贫出现的关键,更是已成功脱贫人口保持生计稳定的必要措施。企业作为与经济接触最为紧密的“组织机构”,无论是在承担社会责任、还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全民生活水平上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利用资金、人才、创新战略^[2-3]等优势去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企业绩效的提升势必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其中。基于后扶贫时代的发展视角,扶贫项目参与及后续扶贫计划对企业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和

内部控制又充当了怎样的调节作用?

本文创新性地以企业作为第一研究视角,采用 2016—2019 年的中国全部 A 股企业为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方法(OLS 回归),在通过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及倾向性得分匹配基础上,对后扶贫时代背景下的扶贫项目的参与、后续扶贫计划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旨在吸引更多企业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后扶贫时代建设,并在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同时更好地对企业绩效进行提升。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两点:①从宏观层面上,产业是扶贫的关键,而企业又是产业的带头人。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在后扶贫建设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多样灵活且有效的经营机制,撬动社会整体资源,形成资源向产品进而向资本的转化过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推进企业经济实践及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资源。②从微观层面上,企业依托贫困区域资源优势,吸引更多资本向贫困区域汇聚,使其在为贫困区域“输血”的同时加强其“造血”功能,保证扶贫过程中资金链供给的充足,为贫困区域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巩固扶贫攻坚的建设成果,更在原材料的供应、生产与销售等大部分环节中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绩效,达成企业与脱贫人口联动互赢的局面。

收稿日期:2021-09-11

基金项目:云南省省院校教育合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YSX202023)。

作者简介:李泽建(1975—),女,湖南长沙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新管理研究;韩佳宏(1995—),女,辽宁锦州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扶贫项目参与及企业绩效

扶贫项目是实现后扶贫时代建设的重要载体。贫困不单是经济学层面的贫穷,更大程度上是贫困人口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及自身发展能力等因素制约,造成各方面比较落后的情况。自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起,积极推动企业的扶贫参与是当下国家发展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在进行扶贫过程中所规划的扶贫项目是以当地资源优势及资源保留的完整性为基础,凭借企业自身在人才、技术及资本方面的优势,结合对市场力量的有效利用,从而把握市场需求动向,采用“企业+农户”的形式完成特色产业链的设立,打造属于当地的特色品牌与项目,与当地人口建立起直接的利益连接关系。其中包括充分的挖掘和发挥当地贫困区域的生态资源优势;规模又标准化的可持续生产,带动当地的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质量得以优化;再通过“互联网+”及交通运输^[4-7]等扶贫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产业和服务的开发^[8],扩大市场上扶贫产业的销售渠道^[9],不断地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共享链条收益。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扶贫项目的参与对企业绩效有正面促进作用;且参与扶贫的项目个数越多,企业绩效越显著。

1.2 后续扶贫计划与企业绩效

后续扶贫计划是后扶贫建设的重要体现,包括生态、生产,以及发展等方面的可持续。从中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随着城市发展的不断推移,城市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资源急剧下降,这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发展,对比贫困区域在全部的发展过程中,自身资源几乎尚未开发的特性,使其拥有相当充足的资源去辅助当地发展与完善。作为前期已经参与扶贫的企业来说,当地生态资源的充足与可持续性,使得考虑后续扶贫计划的企业在相关原材料的供应、人工及生产与销售等方面能够减少其成本的支出。此外政府^[10-11]对于有后续扶贫计划的企业会在建设资金方面提供有关贷款及税收等方面的发展优惠政策,使得企业能够很好地规避信贷的风险,为企业后续的扶贫计划提供充足的资金链供给,缓解企业融资不足的压力,实现后扶贫时代的良性发展^[12-13]。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对企业绩效有正面促进作用。

1.3 管理层持股比例的调节作用

管理层持股是当下企业内部管理中有效的激励措施,有利于激发企业管理人员创造财富价值。管理层持股是通过缓解管理层和企业间的矛盾,形成二者间的黏性,增强对企业自身的认同感。那么管理层的持股比越高就会更正向促进企业绩效吗?高丽霞^[14]根据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上市企业进行分析,指出管理层持股比例反向作用于企业绩效。吉伟莉等^[15]也提出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过高,会造成激励过度,企业更偏向于短期利益的获取而漠视社会责任履行的观点。所以对于参与后扶贫建设的企业而言,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势必需承担企业巨大投资风险,管理层作为企业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企业自身的良好生存及其长远发展直接影响到自身利益,在进行后扶贫建设的过程中,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会将过多资金投放的扶贫项目参与及后续扶贫计划实施方面,所以管理层人员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失,就可能会更加谨慎甚至反对后扶贫时代的相关后续发展建设^[16]。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管理层持股反向调节扶贫项目参与、后续扶贫计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1.4 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企业就当下解决人员就业、市场机制形成、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及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提供了巨大贡献。而内部控制作为内部监督和风险治理的重要管控机制^[17],能够有效地对企业相关业务及决策流程进行管控,给予企业管理者真实、准确的信息决策,使各部门人员间的相互配合实现协同效应,避免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内部控制的完善在降低企业内部日常事务无章可循、无规可依及徇私舞弊事件发生率的同时^[18],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对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及风险管控的能力,增强其经营风险的抵抗力能力^[19],企业管理者为之做出有助于绩效提高的理性决策。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内部控制正向调节扶贫项目参与、后续扶贫计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2016年作为研究起点的原因是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披露的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始于2016年,而2019年是本研究所能获取的

最新数据年份。其他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取自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

参考文雯等^[20]的研究,为了保证数据的稳健性,根据研究目的对所研究数据进行了以下预处理:①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导致其财务结构和收入水平与其他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剔除银行等金融类企业;②ST 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各项财务指标偏离正常值,因此本文进一步剔除 ST 公司;③受到实证模型及变量的限制,本文剔除了变量存在缺失值或异常值的样本。最后,为了控制样本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 水平上的 Winsoriz 缩尾处理。经过数据预处理,最终确定了 10 236 个样本观测值,采用 STATA 15.0 进行数据最终处理与分析。

2.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在股价波动性较大、市场有效性较低的情况下,本文选择被学者们广泛采用的综合性指标 ROA^[21-22]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ROA 能够充分的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体现企业的经营绩效。

2)解释变量有两个:①扶贫项目的参与(Fp_num),即企业在会计年度内所参与扶贫的项目个数;②后续扶贫计划(Fp_plane),若在会计年度内,企业存在后续扶贫计划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3)控制变量:借鉴肖建华等^[23]、尹海员等^[24]、袁知柱等^[25]的研究,为了控制其他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企业规模(Size)、账面市值比(BM)、会计信息不透明度(AbsACC)、两职兼任(Dual)、企业性质(SOE)、资产负债率(LEV)。变量的详细度量方法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度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资产回报率(ROA)	净利润/总资产
	扶贫项目个数(Fp_num)	企业的扶贫项目总个数
解释变量	是否有后续扶贫计划(Fp_plane)	有:1;没有:0
	企业规模(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账面市值比(BM)	股票总市值/账面总资产
	信息不透明度(DA)	修正 Jones 模型残差的绝对值
	两职兼任(Dual)	公司存在两职兼任现象则为 1;否则为 0
	企业性质(SOE)	国企为 1;非国企为 0
	资产负债率(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3 模型设定

在检验企业扶贫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时,本

文借鉴祝丽敏等^[26]的研究,采用 OLS 回归分析,同时控制行业和年度的固定效应,并对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基于本文研究假设,构建以下相应模型进行验证:

$$ROA_{t+1} = \beta_0 + \beta_1 Fp_num_t (Fp_plane_t) + \beta_3 Size_t + \beta_4 BM_t + \beta_5 AbsACC_t + \beta_6 Dual_t + \beta_7 SOE_t + Year + Industry + \epsilon \tag{1}$$

加入调节变量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扶贫的交乘项,检验管理层持股比例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2),即

$$ROA_{t+1} = \beta_0 + \beta_1 Fp_num_t (Fp_plane_t) + \beta_3 Fp_num_t (Fp_plane_t) \times MShrRat + \beta_4 Size_t + \beta_5 BM_t + \beta_6 AbsACC_t + \beta_7 Dual_t + \beta_8 SOE_t + Year + Industry + \epsilon \tag{2}$$

此外,本文还加入了内部控制与企业扶贫的交乘项,检验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3),即

$$ROA_{t+1} = \beta_0 + \beta_1 Fp_num_t (Fp_plane_t) + \beta_3 Fp_num_t (Fp_plane_t) \times InterControl + \beta_4 Size_t + \beta_5 BM_t + \beta_6 AbsACC_t + \beta_7 Dual_t + \beta_8 SOE_t + Year + Industry + \epsilon \tag{3}$$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考虑极端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对数据进行 winsor2 缩尾处理),可见企业绩效(ROA)均值为 0.037,标准差为 0.058;企业扶贫水平(Fp_num 和 Fp_plane)均值分别为 0.342 和 0.268,标准差为 0.513 和 0.443;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标准差较小,其他控制变量的平均数和中位数比较接近,标准差也比较小,符合正态分布的对称性特点,说明了各变量的数值分布相对集中,不存在严重偏离的情况。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ROA	10 236	0.037	0.058	-0.243	0.035	0.190
Fp_num	10 236	0.342	0.513	0	0	2
Fp_plane	10 236	0.268	0.443	0	0	1
Size	10 236	22.33	1.286	19.98	22.17	26.22
BM	10 236	2.302	2.106	0.162	1.669	11.68
DA	10 236	0.065	0.068	0.001	0.044	0.364
Dual	10 236	0.274	0.446	0	0	1
SOE	10 236	0.340	0.474	0	0	1
LEV	10 236	0.419	0.201	0.061	0.408	0.886

3.2 相关性分析

表 3 为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 ROA 与被解释变量 Fp_num、Fp_plane 的

系数分别为 0.039 和 0.035,且均在 1%的水平上正相关。说明在后扶贫时代的背景下,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对企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初步证实了假设 1。同时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

量 Size、BM、DA、Dual、SOE、LEV 与被解释变量 Fp_num、Fp_plane 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显著的,且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上都小于 0.5,说明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是比较合适的。

表 3 相关系数

变量	ROA	Fp_num	Fp_plane	Size	BM	DA	Dual	SOE	LEV
ROA	1.000								
Fp_num	0.039***	1.000							
Fp_plane	0.035***	0.824***	1.000						
Size	-0.009	0.308***	0.323***	1.000					
BM	0.195***	-0.199***	-0.194***	-0.570***	1.000				
DA	0.065***	-0.025**	-0.026***	0.003	0.049***	1.000			
Dual	0.049***	-0.095***	-0.092***	-0.183***	0.138***	0.027***	1.000		
SOE	-0.100***	0.256***	0.269***	0.381***	-0.281***	-0.048***	-0.287***	1.000	
LEV	-0.331***	0.155***	0.160***	0.541***	-0.449***	0.064***	-0.123***	0.293***	1.000

3.3 基本回归分析

在模型(1)的基础上,采用控制年度、行业固定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检验企业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 4 为主回归分析结果。为了检验企业扶贫的直接影响,在第(1)列和第(3)列中,回归仅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未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可以看出,Fp_num、Fp_plane 和 ROA 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后扶贫时代的背景下,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在第(2)列和第(4)列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Fp_num、Fp_plane 和 ROA 的回归系数均在 1%以上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影响 ROA 的因素之后,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另外,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绩效越好;账面市值比与企业绩效成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价值越大,企业的绩效越好;两职合一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两职合一,加剧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自利行为,从而导致公司绩效降低;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偿债能力越低,经营状况越不稳定,此时公司的绩效会降低。

4 稳健性检验

4.1 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

前文研究中采用扶贫项目的参与及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来衡量企业扶贫,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扶贫项目金额(Fp_money)作为企业扶贫的新的衡量方法(表5),由第(1)列可见,仅控制了

表 4 主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1) ROA	(2) ROA	(3) ROA	(4) ROA
Fp_num	0.005*** (3.330)	0.004*** (3.707)		
Fp_plane			0.005*** (2.814)	0.004*** (2.785)
Size		0.016*** (20.554)		0.016*** (20.542)
BM		0.007*** (10.460)		0.007*** (10.443)
DA		0.071*** (6.986)		0.071*** (6.973)
SOE		0.002 (1.418)		0.002 (1.392)
Dual		-0.005*** (-3.233)		-0.005*** (-3.151)
LEV		-0.117*** (-21.594)		-0.117*** (-21.584)
常数项	0.016*** (3.238)	-0.299*** (-16.116)	0.016*** (3.230)	-0.301*** (-16.120)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0 236	10 236	10 236	10 236
adj. R ²	0.037	0.214	0.036	0.214

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未添加其他控制变量。Fp_money与 ROA 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扶贫项目总金额越多,企业绩效越好。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在第(2)列中加入了与主回归相同的控制变量 Size、BM、DA、Dual、SOE、LEV、Fp_money 和 ROA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企业参与扶贫项目的总金额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表 5 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

变量	(1) ROA	(2) ROA
Fp_money	0.001*** (3.283)	0.001*** (2.817)
Fp_pknumber		
Size		0.016*** (20.554)
BM		0.007*** (10.525)
DA		0.071*** (6.973)
SOE		0.002 (1.383)
Dual		-0.005*** (-2.946)
LEV		-0.117*** (-21.552)
常数项	0.015*** (3.201)	-0.300*** (-16.063)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10 236	10 236
adj. R ²	0.036	0.213

4.2 替换解释变量衡量方法

前文研究中采用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企业绩效,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企业绩效新的衡量方法(表 6)。由第(1)列和第(3)列可见,仅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未添加其他控制变量。Fp_num、Fp_plane 与 ROE 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在后扶贫时代的背景下,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在第(2)列和第(4)列中加入了与主回归相同的控制变量 Size、BM、DA、Dual、SOE、LEV, Fp_num、Fp_plane 与 ROE 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4.3 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控制公司层面的不随时间改变的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7。结果发现 Fp_num、Fp_plane 与 ROE 的回归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受企业自身的特征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

表 6 替换解释变量衡量方法

变量	(1) ROE	(2) ROE	(3) ROE	(4) ROE
Fp_num	0.022*** (7.555)	0.017*** (5.738)		
Fp_plane			0.024*** (7.043)	0.017*** (5.006)
Size		0.020*** (12.278)		0.021*** (12.269)
BM		0.011*** (10.236)		0.011*** (10.196)
DA		0.146*** (6.090)		0.146*** (6.072)
SOE		-0.000 (-0.024)		-0.000 (-0.067)
Dual		0.007* (1.879)		0.007* (1.940)
LEV		-0.068*** (-5.519)		-0.068*** (-5.523)
常数项	0.053*** (6.007)	-0.415*** (-11.251)	0.053*** (6.039)	-0.417*** (-11.241)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0 213	10 213	10 213	10 213
adj. R ²	0.029	0.064	0.028	0.063

表 7 固定效应模型

变量	(1) ROA	(2) ROA
Fp_num	0.004** (2.555)	
Fp_plane		0.006*** (2.928)
Size	0.038*** (10.332)	0.038*** (10.339)
BM	0.006*** (8.047)	0.006*** (8.024)
DA	0.018* (1.735)	0.018* (1.695)
SOE	0.004 (1.326)	0.003 (1.284)
Dual	-0.015** (-2.019)	-0.015** (-1.987)
LEV	-0.182*** (-13.372)	-0.182*** (-13.365)
常数项	-0.740*** (-9.203)	-0.740*** (-9.211)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10 236	10 236
adj. R ²	0.144	0.144

4.4 倾向性得分匹配

企业选择扶贫时所考虑的因素可能与该企业绩效有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PSM)进行分析。首先,根据是否有后续扶贫

计划哑变量(Fp_plane),将样本分成两组。其次,选择 Size、BM、SOE、LEV 作为匹配变量,采用 Logit 模型对二元被解释变量 Fp_plane 进行回归,拟合出每一个样本的倾向得分值,该分值体现了某个样本作为参与企业扶贫组的概率大小。最后,根据倾向得分值对参与企业扶贫组 and 没有参与企业扶贫组进行有放回的、匹配尺度为 0.05、一对一的最近邻匹配,最终得到参与企业扶贫组 and 没有参与企业扶贫组。表 8 报告了使用 PSM 配对之后的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后扶贫时代的背景下,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

表 8 PSM 检验

变量	(1) ROA	(2) ROA
Fp_num	0.003** (2.42)	
Fp_plane		0.004** (2.43)
Size	0.017*** (17.47)	0.017*** (17.57)
BM	0.009*** (10.28)	0.009*** (10.27)
DA	0.073*** (5.74)	0.073*** (5.73)
SOE	0.002 (1.23)	0.002 (1.19)
Dual	-0.005*** (-2.91)	-0.005*** (-2.88)
LEV	-0.116*** (-17.32)	-0.116*** (-17.32)
常数项	-0.316*** (-14.29)	-0.318*** (-14.37)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5 018	5 018
adj. R ²	0.292	0.292

5 进一步分析

5.1 管理层持股比例的调节作用

管理层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27]。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一定的代理冲突,管理层出于个人私利,可能不会选择参与扶贫项目。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此时管理层的权力较大,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代理问题更严重,企业参与扶贫的可能性较低。我们推测,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企业扶

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较弱。

本文用管理层所持股份占总股份的比例来衡量管理层持股比例,研究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 9,在第(1)列和第(2)列,Fp_num、Fp_plane 与 MShrRat 的交乘项 Fp_num×MShrRat、Fp_plane×MShrRa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有后续扶贫计划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会被削弱。

表 9 管理层持股比例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ROA	(2) ROA
Fp_num	0.016*** (4.864)	
Fp_num×MShrRat	-0.252*** (-4.069)	
Fp_plane		0.016*** (4.232)
Fp_plane×MShrRat		-0.272*** (-3.740)
Size	0.016*** (21.130)	0.016*** (21.113)
BM	0.007*** (10.668)	0.007*** (10.620)
DA	0.069*** (6.830)	0.069*** (6.856)
SOE	0.002 (1.545)	0.002 (1.476)
Dual	-0.005*** (-3.358)	-0.005*** (-3.286)
LEV	-0.109*** (-18.017)	-0.111*** (-18.611)
常数项	-0.310*** (-16.780)	-0.312*** (-16.739)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10 236	10 236
adj. R ²	0.216	0.215

5.2 内部控制缺陷的调节作用

内部控制体现了一个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企业的经营状况稳定,财务绩效较好^[28],此时公司更有意愿参与扶贫项目。当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时,公司财务绩效较差,企业参与扶贫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我们推测,当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时,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较弱。

本文用是否有内部控制缺陷哑变量来衡量企

业的内部控制水平,研究内部控制对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 10,在第(1)列和第(2)列,Fp_num、Fp_plane 与 InterControl 的交乘项 Fp_num×InterControl、Fp_plane×InterControl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时,企业扶贫项目参与、企业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会被削弱。

表 10 内部控制缺陷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ROA	(2) ROA
Fp_num	0.008*** (5.453)	
Fp_num×InterControl	-0.008*** (-4.346)	
Fp_plane		0.008*** (4.295)
Fp_plane×InterControl		-0.009*** (-3.968)
Size	0.016*** (20.435)	0.016*** (20.395)
BM	0.007*** (10.406)	0.007*** (10.373)
DA	0.070*** (6.807)	0.070*** (6.804)
SOE	0.002 (1.347)	0.002 (1.309)
Dual	-0.004*** (-2.659)	-0.004*** (-2.636)
LEV	-0.116*** (-21.174)	-0.116*** (-21.146)
常数项	-0.304*** (-16.044)	-0.305*** (-16.017)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9 977	9 977
adj. R ²	0.213	0.212

6 结论和启示

以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统计分析方法(OLS 回归),探索上市公司在后扶贫时代的背景下,扶贫项目的参与与后续扶贫计划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内部控制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参与的扶贫项目个数越多、有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都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在进行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固定效应模型、倾向性得分匹配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在进一步研究中还发现,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时,此时

企业的代理冲突越高、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越低,企业扶贫项目的参与、后续扶贫计划的实施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会被削弱。

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获得以下启示:

1)基于后扶贫时代视角,扶贫项目参与、后续扶贫计划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效应,说明当下的资本市场是认可并鼓励企业参与后续扶贫建设。积极响应后续扶贫和振兴乡村的行列建设,有助于企业自身走向高质量长期发展道路,以慈善捐助为主体的传统扶贫方式转化为以承担社会责任,发展创新型产业后续扶贫模式,在“授人与渔”同时实现企业自身绩效的提高;其次,企业管理层人员不应盲目地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参与会对自身相关利益的分配造成损害,相反在企业间竞争尤为激烈的今天,后扶贫的建设发展所提供的正向溢出效应将会为企业自身发展带来更多经济性效益;最后,内部控制作为当代企业尤为关键的治理机制,高质量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加强企业的内部治理,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到企业管理层人员考核范围中,使得管理层人员能够自觉遵守、维护及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从而提升企业内部价值,正向推进企业自身的经济发展。

2)当前中国处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关键时期,为避免返贫及新生贫的出现,加强脱贫成效的持续性,中国政府部门可以不定期地对企业后扶贫时代的建设进行调研及监督管理,健全持续扶贫成效的评价体系,确保后扶贫时代建设的落实程度,实现企业与贫困地区相关联系、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国政府应当充分意识到企业这一经济主体对于后扶贫时代建设所提供的重大贡献,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更多支持,加大力度鼓励及引导企业进行后扶贫时代建设,为中国后扶贫时代的建设工作提供新路径。

参考文献

[1] LYNCH A J,COWX I G,FLUET-CHOUINARD E, et al. Inland fisheries: Invisible but integral to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for ending poverty by 2030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7, 47, 167-173.

[2] 张玲. 评《企业经济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11): 2, 189.

[3] 张一林, 林毅夫, 龚强. 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 管理世界, 2019, 35(3): 31-47, 206.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实交通运输保障[J]. 党建, 2019(12): 48-49.

[5] 龚维进,覃成林,徐海东. 交通扶贫破解空间贫困陷阱的效果及机制分析:以滇桂黔石漠化区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2019(6):111-123,128.

[6] 王萍. 电商扶贫拓宽农民增收新渠道[J]. 人民论坛,2020(15):100-101.

[7] 陈岩,王文会. 农村电商何以精准扶贫[J]. 人民论坛,2020(15):106-107.

[8] 廖斌,王婷. 生态使命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20,36(3):67-70.

[9] 陈慧萍. 生态人类学视角下民族地区生态旅游扶贫研究:以贵州省中洞苗寨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2019,40(12):139-145.

[10] 夏清华,黄剑. 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方式与企业创新投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据[J]. 经济管理,2019,41(8):5-20.

[11] 李晓梅,白浩然. 双重政府权力运作:农村脱贫场景的治理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村庄减贫实践的调研[J]. 公共管理学报,2019,16(4):48-60,170-171.

[12] 苏畅. “精准扶贫”中财政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对贫困人口经济帮扶视角的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34(6):133-142.

[13] 李青芮. 城乡融合视域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走向及其实现[J]. 农业经济,2021(7):43-44.

[14] 高丽霞.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费用的关系研究[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6):58-65.

[15] 吉伟莉,范维超. 管理层持股比越高越利于创新吗?基于不同所有权及行业背景的研究[J]. 会计之友,2021(14):46-53.

[16] 王思雨,陈维青. 企业扶贫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J]. 财会通讯,2021(10):44-46,65.

[17] 李琳,田思雨. 内部控制、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J]. 会计之友,2021(3):124-128.

[18] 曾江洪,曾琪姗,黄向荣. 内部控制影响长期并购绩效的中介效应研究:董事持股的异质性情境[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10):102-114.

[19] 方红星,陈作华. 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有效应对特质风险和系统风险吗? [J]. 会计研究,2015(4):70-77,96.

[20] 文雯,朱沛青,宋建波. 近朱者赤: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同群效应[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23(4):63-75,106.

[21] 张玉明,邢超. 企业参与产业精准扶贫投入绩效转化效果及机制分析:来自中国 A 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 商业研究,2019(5):109-120.

[22] 杜健,丁飒飒. 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之元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19(10):146-162.

[23] 肖建华,王若凡. 科研组织应该控制其衍生企业吗:基于中国上市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的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24):1-8.

[24] 尹海员,华亦朴. 投资者关系管理、新媒介应用与上市公司股价延迟[J]. 财经论丛,2019(4):49-60.

[25] 袁知柱,张小曼.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企业投资效率[J]. 管理评论,2020,32(4):206-218.

[26] 祝丽敏,赵晶,孙泽君. 社会责任承担能提升企业信心吗?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证研究[J]. 经济管理,2021,43(4):71-87.

[27] 朱艳. 董事会组成影响公司绩效吗? 基于家族企业的实证[J]. 财会通讯,2019(8):46-49.

[28] 庞博. 内部控制、非经常性损益与企业绩效[J]. 财会通讯,2020(14):57-59,68.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Participation and Subsequent Poverty Alleviation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nagement shareholding and internal control

LI Zejian, HAN Jiahong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the post-poverty era, Chinese A-share companies from 2016 to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participation and subsequent poverty alleviation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management shareholding ratio and internal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participation and subsequent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have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corporate performance. Further study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enterprises with lower management shareholding ratio and higher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ttracting enterprises to jo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construc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linkage and mutual benefit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enterprises and people out of poverty.

Keywords: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participation; subsequent poverty alleviation plan; management shareholding; internal control; corporate performance